

# 抗战期间邓宝珊的三次延安之行

本报记者 贾晓明



1943年，邓宝珊访问延安，受到八路军列队欢迎。

抗战时期，邓宝珊先后任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其总部设在与陕甘宁边区毗邻的陕西榆林。他拥护和赞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一直保持友好关系，指示所属部队要“维护边区到榆林的交通安全，保护来往人员和物资的顺利出入”。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历次“反共高潮”、封锁边区、制造摩擦之际，邓宝珊以团结抗日为重，拒不参与，并三次到访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接待。

## “国共两党的重新和好，此乃国家民族之福，是深得人心的”

1939年4月，邓宝珊前往武功参加军事会议，因急于赴会，其所乘汽车路过延安时并未停留。此事被中共中央首长得知后深以为憾，叮嘱有关部门：在邓宝珊返回途中经过延安时，一定要盛情挽留。

5月，邓宝珊乘车返回榆林时路过延安，与随行人员住进了一家骡马大店里。延安市公安局得知消息，立即打电话给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负责人金城。金城确认无误后，立即向上级请示。毛泽东闻讯后当即指示，一定要给邓宝珊一行以热烈的欢迎和优待。金城随即向交际处进行了布置，然后来到邓宝珊住的骡马店，找到邓宝珊的随行人员，表达了欢迎之意，并提出请邓宝珊等人移住边区政府招待所。

第二天一早，金城再次来到骡马店，邓宝珊闻声走了出来，客气地对金城说：“这次过延安，时间仓促，没敢打扰边区政府。我们在这里住得很好，就不麻烦你们了。”金城表示：“听说您来了，我已报告毛主席和边区政府。毛主席和边区政府非常欢迎您，希望您能在延安逗留几天，和大家见见面。”邓宝珊听后感到盛情难却，便不再推辞。

不久，毛泽东亲自赶来迎接，并请邓宝珊和随行人员用午餐，李富春、萧劲光、周小舟等作陪，双方相谈甚欢，气氛十分融洽。席间，毛泽东表示，希望邓宝珊在延安“多住几天，到处走走，参观指导。”邓宝珊欣然接受了邀请。

邓宝珊在延安住了一周时间，参观了各地，并旁听了毛泽东在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在延安的中共党政军领导人也都到邓宝珊的住所与他会面、晤谈。邓宝珊老朋友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此时在抗日军政大学读书，也赶来拜会。邓宝珊的二女儿邓友梅于一年前来到延安，进入陕北大学学习，也来见父亲。邓宝珊非常高兴，详细询问了学习、生活情况，并鼓励他们努力上进。

其间，邓宝珊回访了毛泽东，两人进行了长谈。毛泽东向邓宝珊表示：西北军的许多将领是爱国的，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和民主革命的传统。现在国共重新合作了，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只要我们共同坚持下去，并且巩固发展下去，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邓先生在榆林，我们一定能够合作得更好。邓宝珊回答说：“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这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也是全国民众的共同要求，毛先生和周恩来先生在‘双十二事变’中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促成了国共两党的重新和好，此乃国家民族之福，是深得人心的。从此总理生前的愿望，有实现的希望了。”

## “中国有毛先生这样一位领导，是民族之福”

1943年6月，国民党中央电召邓宝珊去重庆“述职”，为阻止邓宝珊途中经过延安，特别命他去“兰州坐飞机”到重庆。邓宝珊非常不满，对身边人说：“不指定路线还罢了，指定了，我偏要走延安这条路。”为了更加细致地参观、了解陕甘宁边区，邓宝珊索性放弃乘车，改为骑马前行。

邓宝珊一行进入陕甘宁边区境内的米脂县时，中共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派在这里工作的杨拯民前来迎接。10日，一行到达绥德。中共绥德地委和边区绥米佳吴清警备司令部召开了欢迎大会，大会由习仲勋主持，“抗大”校长徐向前和邓宝珊在会上做了讲话。17日，邓宝珊等进入延安，下榻边区政府交际处招待所。

当天，毛泽东在杨家岭新建的中共中央礼堂为邓宝珊接风洗尘。出席欢迎宴会的有朱德、贺龙、林伯渠、李鼎铭、南汉宸、续范亭等数十人。邓宝珊与毛泽东一见面，就说：“毛先生发胖了！”毛泽东回答说：“这是我们军民搞大生产运动，丰衣足食所致。邓先生的身体也好得多了！”宴会后，举行了欢迎晚会。由叶剑英致欢迎词后开始演出，邓宝珊看得很高兴，不时鼓掌。随后的三天里，毛泽东、朱

德、贺龙轮流做东宴请邓宝珊。朱德和邓宝珊见面时，讲述了自己曾在云南参加蔡锷领导的护国军之役的情况，邓听得很入神。朱德又向邓宝珊询问了当时陕西的情况，邓也一一作答。贺龙和邓宝珊见面时，谈了自己在红军长征中的经历，让邓宝珊钦佩不已。

第三天，毛泽东出面宴请邓宝珊。宴会前后，大家围坐院内纳凉，谈了很久。毛泽东在谈话中就国际国内形势与邓宝珊交流看法。毛泽东指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面临光明的前途，连蒋介石也感到了这个变化。但蒋介石的对策却依旧是加紧策划反共。希望邓先生和我们合作，要求蒋介石放弃独裁，实行民主。邓宝珊当即表示：自己将为民建国尽最大努力。毛泽东分析国内外形势，见解十分精辟，且谈吐幽默，给邓宝珊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对毛泽东说：“中国有毛先生这样一位领导，是民族之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在北平为您祝寿。”在谈话中有一个小插曲：在谈到胡宗南不去抗日，却以重兵包围陕甘宁边区，叫嚣“闪击延安”的行径时，毛泽东诙谐地把胡宗南的过行为比作“以卵击石”，说胡宗南“不过是挑着两筐鸡蛋叫卖而已，我们给他丢两个石头，就全部砸烂了”。此话一出，引得双方大笑良久。

在随后的时间里，邓宝珊不仅和毛泽东单独会谈数次，也和延安的中共党政军领导人、好友续范亭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 “我是大家的朋友”

9月中旬，邓宝珊离开重庆，临行前为延安采购了一批急需的药品。途经西安时，胡宗南向邓宝珊提出派人去帮他“整顿部队”，企图借此削弱其兵权。邓宝珊当即表示愿意引退，让胡宗南非常尴尬，只得要邓继续“回榆林坐镇”。邓宝珊

回到家乡三原，后经杨明轩等做工作，决定再返榆林，仍选择途经延安。

邓宝珊进入延安前，毛泽东再三指示交际处对邓宝珊“要热情接待”。11月15日，邓宝珊到达延安，仍下榻于交际处招待所。听说邓宝珊因长期劳顿，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毛泽东等对邓宝珊受傅作义之托，代表傅作义与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和平谈判时，穿的就是这件大衣。邓宝珊十分感激，病愈后立即和毛泽东见面，介绍了其重庆之行的观感。

一天，毛泽东派人请邓宝珊叙谈，在座的还有朱德、周恩来与续范亭。谈话中毛泽东说：国共两党发生的许多历史事件，邓先生，你我都是过来人，历史经验证明，内战的路走不通。蒋介石只有在根本上放弃独裁和内战政策，这才是国民党的出路。我们大家都必须为此而奋斗。周恩来、朱德、续范亭也都围绕毛泽东的话谈了自己的看法。邓宝珊听后表示完全赞同。

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邓宝珊参加了丰富多彩的欢迎活动。他参观了陕甘宁边区军民大生产成果展览会，并出席了边区劳动英雄大会。在会上，邓宝珊发表了热情的讲话，赞扬边区军民在大生产运动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并告诉在场干部群众说：“我是大家的朋友。”邓宝珊还在周恩来、林伯渠等的陪同下，出席了交际处安排的文艺晚会，津津有味地观看鲁迅艺术学院创作并演出的剧目，并表示，自己“难得如此轻松”。

12月上旬，邓宝珊离开延安前往榆林。邓宝珊走后，毛泽东在给续范亭的信中说：“邓先生西北人望，调护国共关系，出力甚多，此次南行，讲了许多好话，我们心中感谢您。”

回新安镇，再也不敢出来了。就在此时，据侦察员报告，又有一股敌人援军从响水口据点向杨口赶来。

危急时刻，新四军七旅二十团从盐阜抗日根据地赶来支援。生力军的加入，使参战部队士气大振。渤海军分区首长立即对部队进行了重新部署：二十团主力主攻杨口核心炮楼；一支队二、三团阻击响水口援敌；二十团一个营归四支队指挥，协助四支队阻击其他方向援敌。

5月1日，响水口援敌向一支队二、三团阵地发起进攻，被二、三团击退。不甘心失败的敌人调来大批援军，继续对新四军打援部队发起进攻，又从连云港调来飞机，向新四军投弹扫射，但始终无法突破新四军的阵地。战至5月3日，死伤惨重的援敌逃回响水口。几乎与此同时，其他敌人援军也被各路新四军打援部队击退。

5月4日，对杨口敌人核心炮楼的总攻开始。13时，新四军集中重机枪连和迫击炮连对守敌进行了5分钟的齐射，将敌人核心炮楼的顶部炸穿。还没等新四军发起冲锋，守敌就吓得把枪扔出炮楼，举起白旗投降了。经过16昼夜的奋战，新四军全歼高沟、杨口守敌2500余人，同时击溃新安镇、响水口等地日伪军的多次增援。此战，新四军一举拔除了深入淮海根据地东部最大的据点，为随之而来的解放全部苏北敌占区作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渡江战役中的一个“意外”

张家康

史海观澜  
SHIHAIGUANLAN

1949年4月20日夜，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发起渡江战役。解放军第九兵团二十七军七十九师二三五团的任务是：渡江后在南岸的繁昌县油坊嘴以东登陆，夺取油坊嘴、鸡头山。该团是赫赫有名的“济南第一团”，在这次渡江战役中，指战员们都纷纷表示，要以实际行动，争当“渡江英雄”。

当夜19时20分，二三五团从江北无为县白茆洲的沟渠中拖出隐蔽的船只，翻坝入江。7时30分，二三五团各部均已登船，静候出发命令。团长王景昆传令检查登船情况，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

据二三五团政治部主任王济生回忆，三连一名通信员由于“太紧张，太激动了”，把“调好船头，待命开船”说成了“调好船头，开船”。三连二排的3条船当即开船，直指长江南岸。旁边的七连、九连“哪甘落后”，也驾船“憋足劲直指江心飞去”。团领导立即将情况向师部报告。师首长“为争取偷渡长江的成功”，随即命令二三五团和二三七团“比预定时间提前10多分钟”渡江。

当二排五班的船离南岸百米左右时，被敌人发现，立即集中火力向江面扫射，掌舵的船老大中弹负伤。战士们一面还击一面为船老大包扎了伤

口。船老大忍着疼痛，尽力把船头拨正。当船接近南岸时，战士们冒着敌人的子弹跳下船，强行登陆。

当时，这一地段仍为枯水期，因江岸崩塌造成江岸陡峭，泥土松软。战士们把梯子靠在岸崖上，班长刘德翠第一个攀梯而上，其他战士随后跟进。不想梯子突然向下陷入沙子里，刘德翠身手敏捷，立即用手快速攀住岸崖上的一块突出岩石，避免了坠落。战士李世松和小黄立即拔出梯子，再把梯子架在自己的肩膀上，让班长和战友们继续攀登。经过努力，五班战士全员登上岸崖，消灭了碉堡里的敌人，为后续部队扫清了登陆障碍。21时15分，五班按照事先布置，发射了3颗红色信号弹。

二三五团团长王景昆和团部乘船在江心指挥，看到升起信号弹，立即命令全团各梯队突击登陆，以支援先行登陆部队，并令参谋长向师部发去暗语电报“饭已做熟了”，报告二三五团突击队已经登岸。接着，从二三五团三营强渡的江面上也冉冉升起了3颗信号弹。

二三五团和兄弟部队密切配合，全歼油坊嘴守敌。随后，该团为扩大战果，继续向南突破，和兄弟部队密切配合，于21日6时30分一举攻克鸡头山。

## 王凤阁妙计歼敌

常红

史海观澜  
SHIHAIGUANLAN

九一八事变后，王凤阁在辽宁省东边道的通化、临江交界处的红土崖地区秘密组织200多名农民、伐木工人和中小学教员起义，于1932年3月成立辽宁民众义勇军，被拥戴为司令。

5月19日，王凤阁率部打下柳河县后，通电国民政府及全国报馆，表达了抗日到底的决心。收复柳河后，王凤阁指挥义勇军连战连捷，大批热血青年纷纷加入。不久，王凤阁率部与唐聚五的辽宁民众自卫军联合，将队伍改编为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十九路军，王凤阁为第十九路军司令，先后转战柳河、金川、辉南、海龙、蒙江、临江等地，取得多次胜利。

王凤阁部的不断发展壮大，让日伪十分惊慌，立即调集“精锐”进行“讨伐”。6月，新任伪东边保安司令田德胜亲率所部伪军两个营的兵力，前往孤山子一带“寻歼”王凤阁部。王凤阁得到消息后，立即精心制定了对敌作战方案。

6月20日，田德胜率两营伪军自金川出发，直奔孤山子，途中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见路边农田里有三五成群的“庄稼人”，这股伪军便打听义勇军的情况，得到的回答是：“他们早跑了”。田德胜听后非常得意，立即命令部队“快速向前，以便能赶上义勇军”。当伪军走到样子哨镇与孤山镇之间的鹿尾林子

时，见道路两旁地里干农活的人虽然越来越多，但无异常举动，一派“和平景象”，于是更加放松了警惕。

就在这时，道路两旁突然传来了密集的枪声，骑马走在前面的伪三营营长及其随从被当场击毙。伪三营的官兵急忙向道路两边躲藏。只见田里的“庄稼人”纷纷放下锄头，举起刀枪向伪军冲杀过来，很快将一个营的伪军分割包围。这股敌人除少数顽抗者被击毙外，其余300多人全部举手投降。原来，这些“庄稼人”都是义勇军战士化装的。

走在后面的伪一营急忙往回逃窜。王凤阁率部乘胜追击，击毙、俘虏了200余人，并缴获不少枪支弹药。被俘伪军大都知道王凤阁的威名，又经王凤阁当场教育，近半数被俘伪军表示愿意加入自卫军。

田德胜狼狽逃回金川后，不敢停留，又连夜逃往朝阳镇。伪金川县县长见状，写了一份《呈金川失陷及善后办法》，将责任完全推给田德胜，说由于田德胜的失败，导致县城“官无指挥，兵无战意”，自己也不得不“随之逃命”。

21日上午，王凤阁率部收复了金川县城，又率部一鼓作气攻占了辉南县城，并联合友军破坏沈海、吉海铁路，威胁日伪盘踞的据点，使日伪当局“深有应接不暇之势”。

## 刘逊谦率部勇破天保城

吕传彬

史海观澜  
SHIHAIGUANLAN

刘逊谦早年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受孙中山等人的影响，立志“推翻封建王朝，建立共和政体”。

刘逊谦毕业后回国，以兴办体育为名，秘密宣传革命，联络反清力量，后到上海，继续执教于商团公会，每日率领团员晨起操练，晚间聚集事务所中“消遣议事”，秘密在团员中“历数大家平日在租界上受外国人侮辱之苦”，宣传“非实行革命推翻腐朽无能的清廷，国家不能转弱为强”的道理。

1911年4月19日，上海书业商团成立，商团公会委派刘逊谦为书业商团司令，团员共124人，都是朝气蓬勃、忧时爱国的热血青年。在刘逊谦的教导、训练下，团员们革命情绪非常高昂，“决心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共和国而战”。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上海革命党人加紧筹备，策划响应。同盟会中部总会领导人陈其美连日邀集上海各界人士及商团负责人会商，定于11月3日晚发动起义。

11月3日，湖北商团与巡警首先起事，午后占领巡警总局。刘逊谦率领书业商团于3日下午攻占硝磺局。午夜后，刘逊谦奉命赶赴沪军巡防营，与起义官兵会合，攻占清军最大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11月5日，上海军政府成立。书业商团被编入商团义勇队，扩大招募至100余人，组成一个中队，刘

逊谦任中队长。15日，苏浙起义联军会攻南京，商团义勇队改编为沪军先锋队，刘逊谦任沪军先锋队中队长，于19日率部出征，参加收复南京的战斗。

22日，刘逊谦所部负责攻占南京神策门至天堡城一线的进攻任务。天堡城位于南京紫金山第三峰(西峰)，为南京重要炮台，配有重炮多门，由清廷“悍将”张勋率领江防军凭险固守。

刘逊谦率部跟随起义军于11月29日对天堡城发动进攻，遭到清军激烈抵抗。30日，刘逊谦率所部迅速突破山脚下清军防线，冒着山上敌人的枪炮，奋勇向上攀爬冲锋。就在即将登顶之际，忽见敌军举起白旗表示投降。刘逊谦认为可能有诈，随即下山和其他起义军官商议。刘主张应让守敌下山投降，但部分起义军官却否定其意见，认为应该上山受降。结果，部分上山受降的起义军官兵刚到半山腰，就遭到山上清军的猛烈射击，死伤惨重。

刘逊谦见此情景，愤慨至极，率部发起冲锋，沪军先锋队战士一马当先，冒着敌人的枪炮再次攀缘直上，无人退缩，不少战士受伤。其他起义军见后受到鼓舞，也加入猛攻，血战至次日早6时，终于攻破天堡城清军阵地。

12月2日，各路起义军胜利开进南京城。入城之日，刘逊谦特别召集本部攻克天堡城有功人员合影留念。

## 新四军克复高沟、杨口之战

贾晓明

1944年，日伪军在苏北战场上节节败退，不得不转为“被动固守点线作战”。苏北抗日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迅速对敌人发起局部反攻。1944年4月，新四军三师和中共淮海区委、军分区决定集中淮海军分区一、四支队各三个团，二支队六团，涟水、沐阳、灌云三县县总队共10个团的兵力，彻底拔除日伪设在高沟、杨口两镇的据点。

高沟、杨口两镇位于涟水县西北部，是淮海区与盐阜区两块抗日根据地连接的要地，也是敌人深入淮海抗日根据地东部最大的据点。据侦察员报告，两镇由伪军两个团及伪保安队、伪警察队共2500余人驻守，镇内修筑有互相联结的十几个炮楼，外国设有地堡、外壕、铁丝网等工事，可谓易守难攻；且一旦两镇据点受到攻击，周边的日伪军可通过公路立即赶来救援。为此，新四军三师首长进行了具有针对性的战斗部署。

新四军参战各部于4月19日前进入阵地，将两个镇分别包围起

来。19日夜，战斗首先在高沟打响。四支队十团在起义伪军一个班的接应下，突然从南门杀入镇内，连续攻占了敌人10余座炮楼，并将残敌赶进镇东北角的几个大炮楼内。与此同时，十一团消灭了外围守敌，于20日夜进入镇内，和十团合力围攻残敌。

21日，新安镇日伪军数百人分两路向高沟增援。十一团立即出镇，协同十二团和涟水总队迎击来援之敌。在击退援敌后返回镇内。

23日，新安镇敌人再次出动，兵分两路救援高沟。十一团闻讯后迅速出镇，协同阻击部队击溃援敌一路，并于当日下午悄悄返回，与城内部队里应外合，在镇东门附近将这股敌人消灭。

镇内残敌遭连新四军的数日打击，死伤惨重，又得到援敌被击溃的消息，于是企图突围。24日夜，高沟敌人开始突围，被十团、十一团战士歼灭大半，突围敌人也在途中被四支队十二团和一支队二团全歼。

攻克高沟后，四支队主力立即参加了一支队对杨口敌人的围攻，到25日上午，新四军攻占杨口敌人的外围工事。一支队战士随即实施土工迫近作业，把战壕挖到距敌人炮楼约三五十米的地方，在敌人“眼皮底下”构筑起重机枪阵地和迫击炮发射点。守敌惊恐万分，向新四军发起多次反扑，均被击退。26日到27日，新安镇之敌第三次出动，准备救援杨口，途中被四支队一部和涟水总队击溃。杨口镇内之敌得到消息后拼命突围，遭到一支队顽强阻击，敌人进攻了7次，均被击溃。趁敌人溃退之际，一支队迅速扩大战果，很快攻占了除核心炮楼以外的镇内所有工事。

29日上午，为救援杨口敌人，新安镇日伪军倾巢而出，疯狂向四支队打援阵地进攻。新四军指战员英勇应战，与敌人激战两个小时，最终将敌击溃。十一团乘胜追击，其他部队实施迂回包围，把援敌团团围住，消灭日军一个中队和伪军一部，活捉日军3人。残敌逃